

我庆幸自己生在新中国

□王宏甲



地延伸了我了解历史、认识世界的眼睛。

我读完初一遇到了“上山下乡”。我庆幸自己去插队之前已经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杨家将》，还读了《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毛泽东选集》（部分篇章），还读了《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吉丽雅的道路》《我的童年》《在人间》，等等。

我在乡村夜晚的茅屋里静静地回想，如果我没读过那些作品，我踩着乡村的泥泞，置身绵绵阴雨，那就是在泥泞和阴雨里……但是现在，作品中那遥远的青年男女的人生，或者爱情故事，那么奇妙地让我对乡村的茅屋、树林、金黄的落叶以及河边的草地与波光粼粼的湖面，都有了亲切的感觉。当然不是没有困难，但心中似乎有一种克服困难的“东西”。

渐渐地我知道了，重要的不是我记住了多少故事，而是我所接受的教育（包括我读过的那个时代倡导的书籍），让我懂得了祖国、人类、正义、善良、毅力、顽强，还有什么是真正的青春、爱情……所有这些，都比知识更重要！

我至今认为，人生至少在15岁的时候，生命中该生长出属于品质的东西，譬如情怀、良知、志向和信仰，这非常重要！我之所以庆幸自己生在新中国，是因为几十年后我越来越看到，我在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会在此后的岁月中日益显出弥足珍贵。

我还该特别写下，正是新中国的教育，使我去插队时对农民不那么陌生，并且在农民给予我的许多帮助中，真正体会到人世间有些恩情无法报答，只能铭记。

记得我18岁那年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说着我自己不知道的胡话。我插队的村子只有14户人家，全村只有我一个知青。夏季的大水冲毁了小村连接大队部的桥梁，我们村成了孤岛。村里的妇女们轮流看护我，把老人们认为能退烧的草药熬成汤一口一口地喂给我……1976年冬，我告别生产队的乡亲，就要离开插队8年的闽北山村了，乡亲们把我送到村口，队长说：“你还会来看我们吗？”这句话有无限内容，令我震撼！那以后，我一次又一次重返插队的村庄，看到衰老的笑容是怎样把我视如归乡的儿子，牵衣执手争着拉我回家，我的泪水就像种子那样掉在我种过的土地。

多年后，我曾应邀给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讲课，整节课我只讲了两个字：农民。我说，科学主理，文学主情，在我全部的作品中，最深厚的感情，是农民哺育的。我曾写下：“作为土地，我情愿被谁耕种；作为庄稼，我情愿被谁收割。”

并非只是感情。我是在离开乡村后才知道，泥泞的日子，不只是乡村才有。在都市遭遇的泥泞，比乡村更复杂更深不见底。这时刻，田间村姑的一句话就在我耳边响起：“别怕，把裤腿挽高一点。”可以说，我是在离开农村后，才更加理解了农民。

又过了很多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很复杂的变化，我庆幸自己没有丢弃从少年时代就认取的人生意义。它使我一生都没有羡慕富人的苦恼，没有在任何权力面前感到自卑，也懂得识别专家名流从而知尊敬或者不为所惑，能体会到高尚所给予我的感动，能与最普通的人们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而容易有真朋友。这些都和我自己的生命存在、生活感受休戚相关，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这至今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就文学创作而言，这些就是我全部作品的基础，是我的立场，说白了就是我得以立足的土地，是我情感的归宿、心灵的故乡。

不过重阳节

□刘齐

可以登高，
可以远眺，
尽情赏菊，
尽情品蟹。
但是朋友啊，
我们不过重阳节。

我们只有六七十岁，
为何要过这个节？
我们雄心如常，火力犹壮，
凭什么让我们补阳？
一个阳不够，
还要再加一个阳？

儿童节记忆犹新，
青年节常过革新。
还有一个壮年节，
法律未定我们定，
一天一次过得勤。

你好，九月九，
抱歉，老人节，
彼此若亲近，
再过二十春。

李仲元点评：
奇想翻新，正合吾意。

早岁不知重阳，
近年不过重阳。
问君何厌重阳？
缘我日日骄阳！

大家V微语

学会生活

□刘墉

● 我们常用“宁静”这个形容词。狭义的宁静是指无声的沉寂，广义的宁静是指心灵的平适与造成平适的环境。

● 所以柔美的音乐使我们觉得和谐，森林的鸟鸣使我们觉得悠远，清雅的声音使我们怡然陶醉——都是一种宁静。

● 会插花的人，即使是枯枝两根，凡花数朵，粗陶一皿，也能配置得典雅脱俗，清新悦目。

● 会生活的人，即使是粗茶淡饭，竹床藤椅，蓬门陋室，也能安排得宁静闲适，怡然自得。

海外风情录

把垃圾带回家

□无垠

“日本大街上没有垃圾桶，为什么街头还这么干净呢？”“因为自己的垃圾自己带回家。”

这段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街头采访过路市民的视频最近在朋友圈火了。在日本，无论繁华的街道还是乡村僻静的小道，除了饮料自动售货机旁会设置一些供丢弃饮料瓶、罐的专用垃圾箱外，想丢弃一张废纸，你都找不到垃圾箱。“带垃圾回家”成为国民习惯。

最早提倡“将垃圾带回家”的是有“日本百景”之称的尾瀬国立公园。1972年，为了应对难以清理的山野垃圾，而日本列岛山脉蜿蜒狭窄的地势又不方便分散设置垃圾桶进行垃圾回收，外加野生动物们偷吃垃圾箱的垃圾也令人不安，所以公园里的垃圾桶都拆掉了。

随后，这场“将垃圾带回家运动”扩展到日本全国：不仅观光景点、公园等各地公共场所的垃圾箱被拆除，就连街头巷尾也找不到垃圾桶。外出的日本人，大都会随身携带垃圾袋，自己制造的垃圾自己带回家。数年以后，“带垃圾回家”逐渐成为日本人的国民习惯。

这种习惯，从娃娃就开始抓起。日本幼儿园小朋友外出郊游，老师会要求他们必须随身携带垃圾袋。自己的垃圾自己带回家——这件事就跟洗脸刷牙一样，是从小就必须记住的生活常识。当常识成为习惯时，它就是一种理所当然。

不过，垃圾带回家后，也不能随便乱扔：要分门别类，由专人回收。

日本的垃圾分类，可以说已经趋于极致，单从处理塑料饮料瓶上就可见一斑。首先要把塑料饮料瓶盖子扔掉，再把包装纸放到塑料制品垃圾里，瓶身用水涮一下，踩扁扔进塑料饮料制品垃圾箱。

2005年，日本横滨市将垃圾类别由原来的五类更细分为十类，并给每个市民发了长达27页的手册，其条款有518项之多。以袜子为例，若为一只属可燃物，若为两只并且“没被穿破、左右脚搭配”则属旧衣料。领带也属旧衣料，但前提是“洗过、晾干”。不过，这与德岛县上胜町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该町已把垃圾细分到34类，并计划到2020年实现“零垃圾”的目标。

在回收时，居民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定，在每周固定的时间用标准的垃圾袋摆放在特定地点。以东京都港区为例，周三周六上午收可燃垃圾，周一上午收不可燃垃圾，周二上午收资源垃圾。很多社区规定早8点之前扔垃圾，有的则放宽到中午，但都是当天就拉走。

日本国土狭小，城市居民密集，不适合修建大量垃圾站。及时地处理垃圾，保证了城市的整洁。居民如果乱扔垃圾，就违反了《废弃物处置法》，会被警察拘捕并处以3万到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00~3300元）的罚款。这样做的直接效应是，城市生活垃圾大大减少。日本人年均垃圾产量只有410公斤，为全世界最低。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刘放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
图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61935970566666

读史札记

宽猛相济

□佚名

打开古人谈法律的书，你常会看到一个词儿：宽猛相济。“宽”，就是宽松点儿；“猛”，就是严厉点儿。而“相济”大概就是相互补充的意思。古人一谈法律，大多是说刑法。所以，这个词儿是指刑法的一张一弛。说白了，就是对犯罪分子该狠的时候则狠，该柔的时候则柔。

唐朝时，有个叫唐临的官人。唐临做的官儿不大，可能略大于今天的县长之类的位置。他待的地方，叫万泉县。虽说大唐是个兴盛朝代，可许多县的大狱里仍然关着一批又一批的犯人。万泉县，也不例外。

有一年春天，老天爷特别殷勤，三番五次地喜降大雨，万泉县的田地滋润肥沃。可是，风调雨顺又更需要劳力来耕地插秧，而县大狱里，不知怎的，尽关了些年轻体壮能耕善插的人。这些犯人的家里，尤其需要他们回家帮着干活儿。

唐临琢磨着：如果让犯人们回家干一阵子，岂不是两全其美？一来可以帮助农耕，二来可以显示大唐皇恩浩荡。于是，他请县令放这些犯人回家种一轮地，用种地这些时间来折抵刑期。可县令一听则连连说：“这不行，这些犯人一放准跑。唐大人，您可别让咱吃不了兜着走。”唐临笑着说：“放心，有什么事我顶着。”县令见唐临这般执着，便说自己身体不大舒服，转身回家“躲”着去了。

这招就是灵验，信不信由你。农耕季节过去了。县令身体也没事了。他回到县大狱一看，犯人居然一个没少，全回来了。他心想：“唐大人，真绝！”便问唐临：“大人，为何您对犯人如此宽大？”唐临说：“当初判刑时已是够重的了，犯人肯定会追悔莫及。如果待时机成熟之时给点宽慰，那先前刑罚的效果才会最佳。犯人不仅会觉得自己该罚，而且，还会感念咱们大唐的恩典。”县令想：“这唐大人有两下子。怎么咱就没想到这些！”

古人喜欢辩证，凡事讲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中庸之道。所以，古书中与“宽猛相济”一词儿时常相伴的词儿就有了“刚柔相济”“世轻世重”等。但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些词儿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刑罚的社会效果是最重要的，该用重刑的时候，手软则令盗贼猖獗；该用轻刑或者怀柔的时候，手硬就会把人逼到墙角从而激起民愤。